

先秦儒家

XIANQIN RUJIA
WENXUE SIXIANG YANJIU

文学思想研究

周卫东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Press

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研究

周卫东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研究/周卫东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

ISBN 7-80211-087-4

I. 先…

II. 周…

III. 儒家—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727 号

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研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9.75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50 元(平装)



周卫东，江苏省南通市人，1970年3月出生，文学博士。1990年在南通师专学习毕业后，分配至江苏省滨海县文化馆工作。1993年考入天津美院，攻读文艺理论硕士学位，并完成论著《艺术论要》和《艺术教育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分别获得由天津市政府颁发的第六届、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毕业后留校任讲师。1998年考入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天津市政府办公厅工作。

摘 要

本书力图在西周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下,系统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它的一些理论特征。本乎此,本书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是着重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礼乐”渊源。笔者认为,从礼乐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这是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思想演变的一种尝试。第二个层面是着重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流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我国先秦时期文学观念的演绎;二是文学在先秦文化活动中的价值;三是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蕴涵;四是中和之美对先秦文学的意义。而对于先秦儒家典籍中一些与文学相涉的观念,则是本书在第三个层面所要论述的内容。可见,本书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先秦儒家诸子直接表述的,或涉及到的文本中含有较多文学因子的,或在文本写作过程中显露出文学思想一些因素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了解儒家文学思想发轫期的实际情况,从而揭示它在各个阶段的特点、演变的轨迹,以及它的历史的与理论的价值,这是符合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实际水平的。

关键词:先秦 儒家 文学思想

引 言

先秦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特指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按一般的说法，这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的西周、东周向封建制的王朝——秦、汉过渡的时期，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异常复杂、激烈，导致当时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年间，原有的“奴隶制”价值体系土崩瓦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礼崩乐坏”的局面给这个时代提供了历史上少有的可以进行自由思想、自由发挥的空间，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富意义和价值。

先秦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发轫期，在这一阶段，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由上古时代的混沌状态逐渐走向清晰，清醒的理性精神开始取代神秘色彩浓厚的初民观念。自春秋末期开始，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学派，从扬弃西周礼乐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问题进行思考，并试图提供一个可为他人接受的答案。儒家的这些文化学术思想，不断地与传统以及当时各学派之间进行碰撞、摩擦、对话、交流，不断地圆融、整合、完善，最终奠定了绵亘千古的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

先秦儒家文学思想就是在“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们若从纯文学的视角看，文学的自觉时代是在魏晋南北朝，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诸子的文学思想只是一种理论雏形，文学观念中掺有很多非文学因素，他们对于“文”和“文学”的认识，离现

代相去甚远。在先秦儒家诸子的思想中，“文”是被用来表示自然界中森罗万象的形态及人工彩绘装饰、道德仪则、典章制度、诗乐舞蹈及文辞著作等，内涵极为宽泛；“文学”则指学术文化，包括文、史、哲等方面，均比今人对“文”、“文学”的理解宽泛得多，也模糊得多。受这种认知的影响，先秦儒家诸子的文学思想就有以下特点：第一，文学思想的对象并不完全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而是整个人文现象，包括古代典籍、礼仪制度、音乐舞蹈等；如荀子论中和之美，其论述便将“文章”、“声乐”、“礼义”三个不同的领域打通，而重点则落到“礼”的中和上。第二，文学思想主要依附于政治、伦理等社会问题的言说，缺乏独立性。因此，对于文学的社会功用之类话题关注较多，而对于文学自身的特质则较少留意；许多文学观念既是文学方面的，同时也是他们社会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样，无论从文学对象，还是从文学理论的自身形态来看，先秦儒家诸子提出的许多文学观念，在我们今人看来，显然不属于严格的文学思想范围，离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相去甚远，这既与当时文学自身的不自觉状态有关，也是由当时知识、认识水平所决定的。我们与其称之为文学思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泛文学思想，一种尚未具备文学思想本质特征的前文学思想。

但是，我们应看到，先秦儒家诸子文学思想，已经孕育了后世文学发展的因素。明乎此，我们在审视古代的文献资料时，就应以客观、历史的态度去分析、理解“前文学时代”的先秦儒家文学思想。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先秦儒家诸子直接表述的，或涉及到的文本中含有较多文学因子的，或在文本写作过程中显露出文学思想一些因素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了解儒家文学思想发轫期的实际情况，从而揭示它在各个阶段的特点、演变的轨迹，以及它的历史的与

理论的价值。

本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着重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礼乐”渊源。包括：西周礼乐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繁荣；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文化的形态；西周礼乐文化对先秦儒家的影响；孔子对西周礼乐文化的扬弃改造等几个部分的内容。

笔者认为，从礼乐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这是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思想演变的一种尝试。如用考古学的成果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印证，我们发现，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古城堡遗址发掘的文化叠压关系是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春秋文化。另外，我们从孔子对周公的敬仰，荀子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都已明确指出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学术渊源。这说明春秋间产生的儒家文论因子，无论在思想，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与西周礼乐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可以说，正因为有作为历史源头的西周礼乐文化，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礼乐”为价值取向的儒家文学思想因素。因此，我们只有了解西周礼乐文化，才能对先秦儒家文学思想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

第二章着重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流变。包括：我国先秦时期文学观念的演绎；文学在先秦文化活动中的价值；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蕴涵；中和之美对先秦文学的意义。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所包含的原生因素，除了文史哲融为一体的形式和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外，还与先秦儒家对文、文章、文学、文艺等概念的理解有关。但古代所谓文学、文艺、文章等概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先秦学术体系比较含混，只是一种启蒙的状态，尚不像后世那样的分门别类，系统严密。但先秦儒家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包括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以及

一些文学观念的雏形的影响，还因为一些间接影响后世文学思想发展的因素，如关乎思想观念、思维特征、人格修养、处事态度等方面的思想观点，通过影响作者而影响到文学思想，更是不可轻忽的。这是因为，我国先秦时期，在诸子百家出现前的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能够反映出当时对于文学乃至有关文化现象的看法，多为零散之词而载于春秋时代编成的《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中，随着代表中国最大思想流派的儒家及其孔、孟、荀诸子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在文学审美领域中缺乏规律性认识的局面才得以改善。

中和之美，这一理论基础的产生、形成及基本完善，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诗歌、音乐如同歌曲的曲调、歌辞一样是不可分的。以乐为对象的批评观念，时常涉及且适用于诗学批评，《尚书》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从乐的角度来说诗。它是中国古代美的创造与欣赏的一大追求目标和重要指导原则，是汉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一种重要、稳定而富于积极意义的有机构成。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我国古代艺术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它对当时及后世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和之美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它是汉民族源远流长的一大审美理想，是已潜入人们深层意识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有机构成之一，是中国古代美学中一个至为重要而高级的范畴。从理论实质看，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艺术和谐观。因此，自汉代之后历代正统诗学无不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和评判诗歌优劣的标准，我们可以说，中和之美的思想观念，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将永远不会消逝。

第三章着重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政教意蕴。包括：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兴、观、群、怨的政治内涵；孟子

文学思想中的道德意味；荀子文学思想中的伦理色彩等内容。我们从先秦儒家诸子对于文学的认识来看，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价值，即把文学活动与政治伦理价值的认识合而为一，强调要从道德情感中体验文学美的境界，这就是所谓“乐”的深层内涵。先秦儒家历来重视乐教，他们认为“乐”是移风易俗、陶冶性情的重要工具，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并将仁、诚与政治伦理价值作为“乐”的内涵，把真、善、美统一起来，这确实是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在我国先秦时期，“美”与“善”两字在不少情况下是同义词，所谓“美”实际上就是“善”。这样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但“美”究竟还是同“善”有区别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善”。如“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①。这里的“美”，其含义明显不同于“善”。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把脱离伦理道德的善，以单纯的视听上的快感为美，看作是一种腐化堕落的表现。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美同善才经常密不可分，美就是善。强调美与善的密切联系，这使得中国古典文论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高度重视文学审美的社会作用，处处要求把文学审美同低级趣味严格区分开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资源。

孔子历来注重礼乐的社会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的功用，因而他提出了诗的“兴”、“观”、“群”、“怨”之说。“兴”、“观”、“群”、“怨”说从抒情性、感染力、认知功能和社会政治教化效果等诸方面，系统概括和总结了诗歌的政治社会伦

^① 《左传·桓公元年》。

理道德的各个特征。因此，对孔子兴、观、群、怨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先秦儒家文学活动的把握。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历来认为，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陶冶性情，使人感发兴想。同时，诗还具有观政、观志、观民俗与调整人际关系，使之和谐的功能。而且，《诗》还是当时政治与外交中不可或缺的辞令。所以孔门将《诗》作为培养“君子”的必修课程。至于普通民众，则可以通过诗教，使之“怨而不怒”、“怨而不乱”，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②。另外，我们从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话中，也可看到他认为诗教除了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外，还可以增长关于鸟兽草木的知识。可见，孔子注意到诗歌与政治、民情风俗、思想感情等的密切关系，并且很重视发挥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教育作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贡献。

孟子是先秦继孔子以后又一位积极倡导仁政的儒家代表，他的理想政治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社会上的“人民”是最可宝贵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③。“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心”^④。他把“得其民”看作是帝王“得天下之道”，帝王之得失天下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表现了孟子的政治卓见。因此，从他的政治理想出发，孟子的文学思想，基本

① 《论语·阳货》。

② 《论语·阳货》。

③ 《孟子·尽心下》。

④ 《孟子·离娄上》。

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挥和深化。他对于文学的审美认识，是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他的天道观、认识论、人性论，特别是伦理道德观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场合，他的文学思想就是在阐发自己的人性论或伦理道德观时体现出来的，因而它们之间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先秦儒家诸子的一个显著特点。

荀子时近战国末年，礼乐文化进一步衰落，强权和实力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荀子鉴于孟子游说失败的教训，针对孟子学说疏阔而不切实用的缺陷，力图使儒学的政治主张实用化，人生哲学世俗化，表现出一种务实求用的理论特色。这样，荀子的文学思想与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以“性恶论”为基石，把文学美的要求看作与人性本有的欲望联系起来。相比之下，他不像孔子那样强调“乐”的境界，也不像孟子那样强调文学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作用。他系统地考察了文学的审美情感同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文学审美的愉悦同非审美的愉悦的区别，以及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荀子认为，文学艺术具有“美政”、“美人”、“美俗”的社会意义，它们的政治教化作用与“礼”相同，是“治国一民”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此外，荀子还标举《诗》、《书》、《礼》、《乐》、《春秋》在思想体系中的经典地位，认为这五部书是承载圣人之道经典的经书。如此推重五经，在先秦尚属首次，肇后世儒者以“宗经”论文之端。其以文为载道工具的思想，也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史上“文以载道”观的滥觞了。荀子还归纳总结了先秦儒家重和谐、求中道的思想，提出“《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的观点，所谓“中声”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在表现形式上的更为凝炼的表述。总之，到了荀子时代，先秦儒家的文学主张与活动在成熟的同时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向，并因此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第四章着重阐述《周易》、《诗经》、《尚书》的文学思想。先秦儒家经典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考据学，以及政治、伦理、教育、宗教等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些经典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观、政治观、道德观、历史观、美学观、文学观及宗教观等各个方面，并渗透到社会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之中，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投射下巨大的影像。因此，先秦儒家典籍中一些与文学相涉的观念，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否则就很难全面、准确地认识先秦儒家文学思想。

在先秦儒家的典籍中，我们首先要谈到《周易》，它包括“经”、“传”两个部分。《易经》原为占卜之书，其性质兼具两面，为“巫术之余绪，哲思之原点”。这部书的特点是以阴阳符号来象征现实世界中某一特定的具体事物，再经过先秦儒家在《易传》中对其思维的观照模式进一步阐述后，对后世文学家体会形象思维的特征颇有启发作用。《易传》是战国中后期出现的一部思想丰厚的哲学著作，其中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对后世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总体说来，《周易》“经”、“传”中的二元对立思想与蕴涵的美学观念，对后世文学追求创新求变和文学境界理论的形成，不无肇始之功。此外，《周易》文本在成书的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周易》卦爻辞中体现出的诗歌风格与文学手法，以及卦爻辞中体现出的诸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价值，使得《周易》这一文本，在研究先秦儒家文学思想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诗经》，又称为《诗》，或称为“《诗》三百”，其“经”的尊号，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事情。《诗经》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此前的文学，是一种不自觉的创造与记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群体意识，那

么我们在《诗经》中看到最多的，则是一种心灵的自觉咏叹，它意味着原始歌谣阶段的彻底结束，标志着成熟诗歌形式最早的形成。这些诗歌句式整齐、音韵和谐、语言洗炼、感情率真，表现出浓厚的礼乐文化精神。同时由于《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文学比兴手法的起点，所以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我国历来有重史的传统，先秦时期，史家之文从类同甲骨卜辞的钟鼎彝器铭文发展为洋洋大观的史传散文，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记人，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尚书》既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散文集，虽“佶屈聱牙”，古奥难懂，但通过语言的运用和人物的塑造，表现出了文学的形象性，反映着散文的发展和成就。另外在《尚书》文本中，确实存有不少文学思想的因素：第一，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最早对诗歌表情达意功能进行理论概括的，是载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①“诗言志”说不仅揭示了诗歌的功用，还涉及到诗歌与音乐，诗歌与政治教育的关系。近人朱自清称这一诗学理论是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第二，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兼记叙与论说的散文集，其本身就具有奠基的意义，为后世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第三，《尚书》的文章独具特色，它在记言与论事之中，其写作手法与风格也孕育了生机无限的文学胚胎，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第四，从《尚书》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典、谟、训、诰、誓、命实是古代各种文体的

^① 《尧典》编辑成文的时代，近代学者推定为春秋战国之时。但其思想材料所来有由，而“诗言志”说也可能是较早的说法。

渊源所在，并对后世文学体裁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鉴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从《尚书》文本入手，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尚书》影响后世文学的思想形态。因此，《尚书》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献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依据。

第五章着重阐述《春秋》、《左传》、《国语》的文学思想。在先秦史家之文中，《春秋》并非文学作品，甚至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文学色彩。但是，我们从《春秋》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孔子不仅首创了编年之体，而且他在修史的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政治思想倾向。另外，《春秋》在记述事件时，使用了谨严的格式与法则，采用了合乎逻辑的句法，选用了朴素而精确的言辞，因此，《春秋》在内容、叙事和语言等方面都很有特点，较之《尚书》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样，在文史一体的时代，《春秋》毋庸置疑是记事的典范，它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法典意义的史著，它在后人心目中成为一座巍峨的叙事丰碑，赢得了“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之类的赞语，也确实产生了“师范亿载，规模万古”^①的历史作用。叙事须依时序而行、文字要多加锤炼推敲以臻精练、作者应依据思想道德原则对所述事物进行颂扬与挾伐，这三条构成了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根本，成为无数史家与文学家共同拥有的风格特征，这对后世文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国先秦的史家之文，自《尚书》的无序叙事，到鲁国《春秋》叙述事件，经孔子重新叙定，《左传》在《春秋》的基础上再述一遍；如果说孔子重新叙定给春秋史事以政治秩序的整合，那么《左传》的再述则赋予这一文本学色彩，这标志着先秦史传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同时，

^① 刘知几：《史通·叙事》。

《左传》载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以及“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观点都对后世文学有广泛影响。前者将言辞提到了能够垂范后世的地位，后者肯定了言辞的文学性质。另外，《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的历史事件，对后世的文学思想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吴公子季札在鲁国依次倾听各地的诗乐演奏，并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评价其美学特征，还由音乐推测判断各诸侯国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状况。这一历史记载不仅提供了一个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审美活动的范本，而且季札在评价各地诗乐时用“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断语，标举了追求情感和谐、节制的中和之美。这样，季札的评论也为后世“诗可以观”、“移风易俗”等看法提供了权威性的例证。

因此，《左传》历来备受推崇，后世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一直将它奉为典范。如刘知几所谓：“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①。方氏亦认为：“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②。刘大櫟赞曰：“《左氏》情韵并美，文彩照耀”^③。刘熙载说：“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④梁启超更是评价道：“《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

① 刘知几：《史通·载言》。

②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2。

③ 刘大櫟：《论文偶记》。

④ 刘熙载：《艺概·文概》。

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①

事实上，我们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到，若就先秦史传文学而论，《左传》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其文学技巧都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又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左传》作为先秦儒家经典，同时又是先秦著名的历史散文，是研究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国语》是记录整理于战国时期的史籍，相传是左丘明所作，但种种说法不一，又有所谓“春秋外传”之说。《国语》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是继《尚书》、《春秋》之后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从先秦文学的发展史来看，作为史家之文的《国语》自有特点，与《尚书》、《春秋》相比，显然已经大有进步，它在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不乏虚构和想象；文章的结构上也有追求宏大叙事的因素；其语言自然流畅，风格则殊异有别、不尽一致。这些特点，体现了史家之文新的发展。虽然总体说来，《国语》的文学性尚不及《左传》，但其少数篇章则又有所过之。因此，在先秦文学的发展史上，《国语》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六章分别阐述《论语》、《孟子》、《荀子》文本中彰显的文学价值与功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理性人文思想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周王权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天下纷争，新的经济制度孕育着新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巨大变革激发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士阶层的崛起，造就了一批思想家应运而生，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也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空前发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于是产生十家九流等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我们称之为诸子散文。

^①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